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群众工作

(初稿)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2007年5月

编写提纲

绪 论

第一章 南方局群众工作机构的建立及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的开展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党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的基本形势

- 一、民族生存危机加剧之下的民众救亡运动
- 二、国共两党为挽救民族危机力谋转寰
- 三、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开展的群众工作
- 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 组织开展青年运动
- 组织开展妇女运动
- 组织开展群众救亡运动

开展乡村群众工作，在部分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第二节 相持阶段到来后，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方针政策的调整

- 一、相持阶段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 英、美、法等国政府推行扶日抑华政策
- 日本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
-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活动
- 二、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方针政策的调整

第三节 南方局群众工作机构的建立和群众工作新局面的开辟

-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
-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
- 三、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
- 四、中共中央南方局职工组

第二章 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运动，推动团结抗战

第一节 加强群众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 一、发动组建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战团体
- 1、广西、湖南等地的战时工作团
- 2、建立群众性抗日武装——“抗日十人团”

二、推动民众救亡团体的深入发展，深化全民抗战方针

1、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2、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三、深入开展妇女救亡运动

1、江西省妇女指导处

2、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3、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四、为渡过相持阶段，动员和组织大后方广泛的群众力量

1、组织好向大西南转移的群众力量

2、建立群众性的党的外围组织

第二节 领导“反汪”运动，发动群众阻止投降逆流

一、根据中共中央的反汪指示，引导各界群众强烈声讨汪逆叛国行径

二、领导南方局所属各级党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和群众组织全面展开讨汪运动

三、持续推进反汪运动的深入发展

第三节 推动民主宪政运动，促进抗战民主进步

一、推动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力促时局好转

二、进行针锋相对的民主政治斗争，击退反共逆流

三、民主宪政运动的再度兴起

四、宪政运动的新探索——豫鄂边区宪政促进会

第三章 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创造性开展群众工作

第一节 反共高潮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的影响

一、国民党顽固派对群众运动的防范、压制和破坏

1、对学生运动的限制

2、对工人运动的防范

3、国民党顽固派对各地群众运动的破坏

二、群众工作的整体逆转

1、群众运动的逆转

2、封建帮会组织对抗战的影响

第二节 贯彻隐蔽精干方针，转变群众工作方法

一、中共中央有关转变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的指示

二、切实转变群众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

第三节 提出“三勤”、“三化”方针，与群众建立

血肉关系

一、执行“三勤”政策，切实转变群众工作方式

- 1、勤业，巩固社会职业
- 2、勤学，提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
- 3、勤交友，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二、执行“三化”政策，推进群众工作的深入发展

- 1、实行“职业化”，奠定群众工作的社会基础
- 2、实行“合法化”，增强群众工作的政治基础
- 3、实行“社会化”，不断拓展群众工作的领域

第四节 创建“据点”，建立党加强群众工作的新途径

一、“据点”的初步建立

二、推动“据点”的全面发展

（一）据点的主要工作

- 1、交朋友的工作
- 2、团结积极分子，建立领导核心
- 3、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 4、开展生活互助
- 5、进行反特务斗争

（二）据点工作的内容和特点

- 1、学校的据点
- 2、职业青年和公务员的据点
- 3、青年工人的据点

第四章 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在民主运动高潮中迎来抗战胜利

第一节 围绕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开展群众运动

- 一、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萌生及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斗争
- 二、中共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
- 三、成都“市中事件”
- 四、与各界人士一起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

第二节 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反对“一党国大”的斗争

- 一、动员群众反对蒋介石召开一党“国民大会”
- 二、青年学生的斗争

三、妇女界的斗争

第三节 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工作，推动民族地区抗战民主进程

- 一、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 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奋起抗争，反对独裁苛政
- 三、海南白沙起义，反对民族压迫

第四节 领导重庆胡世合运动，掀起群众运动新高潮

- 一、胡世合惨案
- 二、南方局领导争取人权保障斗争
- 三、悼念、惩凶、出殡，群众斗争步步深入扩大
- 四、胡世合运动的基本经验
- 五、胡世合运动的影响

第五章 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共同为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

第一节 广泛动员群众，推动重庆谈判，争取战后和平

- 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 二、广泛动员群众，推动重庆谈判

第二节 领导昆明一二·一爱国运动，掀起人民民主运动新高潮

- 一、昆明一二·一运动的开展及南方局对运动的领导
- 二、动员社会各界，掀起人民民主运动新高潮

第三节 发动社会各界，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 一、政协会议召开前的斗争
- 二、发动社会各界，促进政协会议成功

第四节 围绕维护政协决议，领导群众进行反内战斗争

- 一、“较场口血案”与维护政协决议的斗争
- 二、领导群众进行反内战、求生存的斗争

- 1、工人运动
- 2、青年运动
- 3、妇女运动
- 4、农民运动

第六章 南方局东迁与西南地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第一节 南京局继续加强群众工作，推动反迫害、反美军暴行运动的高涨

- 一、与反动派暗杀的不懈斗争
- 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爱国运动
- 三、党在上海发动的“二九”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斗争

第二节 促进第二条战线形成，加快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一、求生存、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继续开展及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 1、各界群众的斗争
- 2、学生的斗争
- 3、工人的怠工、罢工斗争
- 4、农民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

二、促进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第七章 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历史特点与基本经验

第一节 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历史特点

- 一、以学生运动为主导
- 二、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融为一体
 - 1、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互支援
 - 2、党适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作准备
- 三、工作注重“以点带面”
- 四、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第二节 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不渝
- 二、实施党的领导毫不动摇
 - 1、党在领导群众工作中，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 2、群众工作的发展循着党的工作方针前进
 - 三、帮助群众谋取利益为最高宗旨
 - 四、讲求斗争策略视为生命

后 记

第一章 南方局群众工作机构的建立及国民党统治

区群众工作的开展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华北的大片国土尽落敌手，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渐呈倒悬之势，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怒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肩负民族命运的两大政治力量，即国、共两党在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摒弃前嫌，共挽危局，为共同领导民众抗战而积极合作。

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开展了有规模、有声势地的民众救亡运动，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工作基础。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时期群众工作的需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及时建立健全了群众工作领导机构，适时调整群众工作的方针和方法，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组织群众团体、宣传机构，广泛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运动，迅速开辟了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的新局面，有力地团结了人民、争取了多数、打击了敌人。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党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工作的基本形势

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对我国的疯狂进攻，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民众的救亡运动如火山爆发之势澎湃开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竭力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积极团结、动员全国各界各阶层民众抗战，领导国统区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

一、民族生存危机加剧之下的民众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次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短短四个多月内，就侵占了我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这是日本在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事变发生后，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

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不断膨胀。1933年5月签定的《塘沽协定》，不但使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变为日本所有，还把冀东、平北地区划为所谓缓冲区。之后，日本侵略者把矛头指向了华北。1934年至1936年，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华北事变。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密谋策划，挑起第一、第二次察东事变，张北事变，形成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上演了一幕幕“自治”丑剧，对华北实施了空前的经济掠夺，使华北大部分地区被其所控制。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激起中国的举国愤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九一八事变后，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起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打击日本的经济侵略。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沈阳各厂的工人，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区的矿山工人，辽宁的纺织工人，安东丝厂的工人，南满铁路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沈阳兵工厂的一批工人离厂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广大农民也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持自制武器开展抗日斗争。爱国青年学生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十分活跃。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传开，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罢课请愿、组织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九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又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

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

华北事变后，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各军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厉害冲突和政见分歧，都应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表示，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随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于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痛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北平各校通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号召全民抗战救亡。当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时，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

国请愿游行。当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学生们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4日，获知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學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愿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慑于人们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民众纷纷行动起来，各大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斗争。12月12日，沈君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次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在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立即通电全国：“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为日军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感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为国之目的”^①。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坚定立场和鲜

^①转引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迅速行动起来，男女老幼同仇敌忾，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支援抗战的热潮迅速掀起。中共北平市委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在宛平、长辛店，在北平等地，不分男女老少，都显示出守土抗战有责：当地居民们自动地为中国守军挖战壕、抬担架，运送弹药、物资，送水送饭，连小学生也组织起募捐队，沿街募捐，支援抗战；工人们为修筑工事把大批铁轨、枕木、麻袋送往前线，农民们为部队出粮、出草、出民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各派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慰劳抗日勇士，许多爱国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奔赴前线。从北平城到卢沟桥一带十几公里的大道上，支援抗战的人群络绎不绝。全国性的文化、新闻、学术、宗教及其他救亡组织，积极开展宣传和抗日募捐活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团结御辱的坚强决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群众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国共两党为挽救民族危机力谋转寰

在民族危机日愈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国共两党力谋转寰，几经周折，终于捐弃前嫌，再次携手，共赴国难，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通过的决议首先分析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当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

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会议还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瓦窑堡会议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是遵义会议的继承和发展。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国共两党展开了多渠道的接触和谈判。1936年初中共代表即与国民党代表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初步谈判；西安事变前，中共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以初步建立了联系。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国共双方加强了联系。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只有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愿为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

为了促使中国共产党出兵抗日，以减轻国民政府军队的压力，7月17日，蒋介石同意、并在庐山重新与共产党代表谈判。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分兵四路直扑山西、中原、青岛、徐州。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不敢再拖延，开始认真对待国共合作抗日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国民党终于与中共达成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

党军作战。

为了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的情况，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南方各省党的组织。长江局成立前，南方各省已经建立了中共河南省委、湖北省工委、南方工委（指导广东、广西、云南党组织）、江苏省委、湖南特委，但这些地方省级以下各级组织并不健全，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则尚未建立统一的省级党组织。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考查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着重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长江局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在没有建立统一的省级组织的地方，恢复、建立省级党组织。1938年1月，在湖南特委的基础上组建了湖南省工委，派高文华任书记。2月，由邓止戈、秦天真等人组成贵州省工委。3月，重建广西省工委。4月，撤销南方工委，组建了广东省委。同时，在皖中工委、安徽工委的基础上组成新的安徽省工委，彭康任书记。1938年2月以后，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组织逐步建立了省工委、临时省委或省委。在已建立省级党组织的地方，健全了省委内部机构，发展省以下各级党组织。许多省委、省工委和省级的特委，都成立了组织、宣传、军事、民运、统战、职工、青年、妇女等部委，有的还设立了文委、教委和难民工作委员会。各省的基层组织（从县委到县级支部）有的遍及全省，有的覆盖大多数县。这就为做好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和组织基础。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国民政府顺应民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国民党、共产党、国家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共25人为参议员，共商国是。随后，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及会谈中，多次提出应将国防参议会扩大为国民参议会。国民党采纳了这一建议，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一些要求，规定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并明确规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也为我党参政议政争得一个阵地。1938年夏天，国民党在武汉宣布设立国民参政会，中共毛泽东、陈绍禹（王明）、

林伯渠（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被“遴选”为“文化界”的参政员。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全部出席了7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他们和许多抗日爱国的参政员联署或分别提出并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战、进步的提案。

虽然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式形成。但国共两党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中共中央提出和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¹因而，中共中央坚持把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作为党的力量从根据地转向全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等都强调要加强民运工作。²全面抗战路线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亦即实行人民战争。这是指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而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因而不广泛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予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等。两条抗战路线的对立是造成后来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群众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屡遭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的根本原因。

三、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开展的群众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往武汉后，许多机关、工厂、学校也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1937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区、东南分局、新四军党的工作。长江局除设组织部、宣传部、党报委员会外，还专门设有民运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长江局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和招生工作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国际宣传

¹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66页

² 转引自《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0页

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群众工作。尤其注意抓好城市、乡村、救亡团体、救亡报刊、救亡活动等的统一，组成救亡运动的整体，使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并且形成了由中心向整个国统区城乡辐射的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救国的军心民气。

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38年初，长江局成立了工委，由刘群先任工委书记，蔡树彬、和廖似光任副书记。长江局工委归董必武负责的民运部领导。刘群先和廖似光代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公开与国民党控制的工会打交道，搞工会团结抗日统战工作。蔡树彬代表湖北省工委主要负责党内秘密联系和发展党员工作。周恩来对工委的工作做了精心部署。他指出：当前处在抗战高潮，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公开地号召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又要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人中扎根建党。国民党虽然已经被迫承认了我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虽已再次形成，但国民党对抗战、对人民、对我党还是抱两面态度。因此，我们在工作上要采取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的统战与地下发展党组织相配合的方针。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和长江局的意见，《新华日报》于1938年2月16日发表题为《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的社论》，号召工人职工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帮口、不分民族、不分信仰地都加入统一的工会组织，呼吁按产业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

长江局工委很快与朱学范及其“劳协”取得联系，与之共同酝酿发起组织全国工人抗敌总会。1938年初，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推举朱学范为筹备总会负责人。3月19日，长江局对筹备工人抗敌总会作出两条决议：一是对总会纲领章程表示赞助；二是批准蔡树彬、刘群先、廖似光、袁青纬等参加该项工作。至4月中旬，各地申请入会的团体有30多个，其地域为粤、湘、鄂、皖、豫、川、赣、晋、陕、甘、宁、苏、浙、闽、沪、南京及海外等，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各职业产业部门及特种工业工人，如此踊跃的盛况，实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所少见。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全国工人抗敌总会最终未能正式成立，但以该会筹备会名义向国民党当局申报召开的纪念“五一”群众大会，有武汉三镇8万工人参加，会上打出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旗帜，廖似光代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上台讲话，扩大了党的影响，使更多的工人站在中共一边。

长江局工委还注意把工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点放在深入基层上。一方面派人联络几条铁路线的工人抗敌组织，另方面派人到上海、武汉、郑州、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联系开展工人抗日救亡工作。在铁路线上，通过联络站

的掩护，秘密派人到各条铁路线工作。还安排一个由上海工人组成的抗日救亡工作团开展活动。在武汉市，以汉阳兵工厂、武昌的几个纱厂、面粉厂和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等为重点，宣传并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组织许多文工团、服务团、慰劳队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搞宣传工作。7月份，日机大轰炸，武汉的工厂停工搬迁，部分工人失业。长江局工委主要开展了布置转移、撤退的工作，动员部分工人随厂西迁，并陆续选送一批优秀工人到延安和新四军工作。

组织开展青年运动。长江局成立不久，就成立了青年运动委员会，由于光远任书记，蒋南翔、杨学成、谢邦治、张维明任委员。1938年2月改由宋一平负责青委工作；3月，青委改组，由宋一平任书记、于光远、黄华任委员。青委的工作由凯丰具体负责。长江局青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青年运动，争取更多的青年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同时，动员抗日青年到延安、到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青委成立之初，由蒋南翔负责，用救国会上海给全国学联的一笔钱出版《战时青年》杂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针对全国学联部分领导人先后抵汉的情况，组织恢复学联的工作。并决定在武汉筹备召开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8年3月25日，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商会大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16个省市的主要学生团体，共73个单位、120名代表。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物周恩来、郭沫若、陈成、黄琪翔、康泽、邵力子等到会祝贺。郑代巩任学联主席，蒋南翔任秘书长。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理事、世界学联委员、中国学联常委兼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共党员陈柱天报告了在巴黎举行的反侵略会议的情况。大会以“使全国学生之组织更形巩固、救国之工作愈有成绩”为目的，着重讨论了今后学生救亡运动的方针，并商议了战时教育问题，号召青年为抗战服务，参加抗战。周恩来为大会特刊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陈成也多次接见代表，并到会作了报告，介绍前线情况。大会27日闭幕。《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通过这次大会，定下全国学生达团结的基础，使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为策动全国学生参加救亡工作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次大会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全国的青年运动。

长江局青委还注意组织和依靠各青年救国团体开展工作。如武汉的青

年救国团（青救）、总部搬迁到武汉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陕甘宁和陕西的西北青年救国会（“西青救”），广东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等。在武汉影响比较大的是“青救”。青年救国团成立于1937年12月28日，总务部长袁汝镛、组织部长姜纪常、刘玉柱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中北大清华的骨干分子。总团部还设有秘密党团组织，由杨学诚、姜纪常分任正副书记。青救起初仅限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后经广泛向社会各界宣传和组织，很快就发展到工农兵商青年群众中去了。经过半年多时间，便扩展为全国性的拥有4万多成员的青年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青救积极努力地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如力倡青年参战运动，仅武汉就有200余名青救成员考入各种军事学校，在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团员达7000多人；还积极参加后方各地动员民众的工作，服务伤兵医院、慰劳前线将士，服务难民收容所，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举办各类训练班，参加三镇重大抗日活动等。其间，王明提出了“民先骨干论”，为了与国民党的“三青团”抗衡，他建议并主持召开长江局会议讨论通过，下发文件，决定大力发展“民先队”，在全国所有地方建立“民先队”，试图以“民先队”来统领全国的进步青年团体。这一做法是以长江局名义下发带有全国性质的决定，超越了职权范围，违反了组织原则，决定本身也是脱离实际的，国民党不可能允许中共领导的“民先队”在全国广泛发展。决定推行两个月后，在延安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被中央否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运动，仍依据各地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组织青年开展活动，及时挽回了影响，减少了损失。8月，正当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了民先、青救、蚁社三个抗日青年团体，并派出军警和特务查封了青救总团部。这一行径遭到中共和各界的强烈抗议。三团体的成员被迫相继奔赴延安、或转入敌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组织开展妇女运动。1938年3月，长江局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孟庆树、委员孟庆树、邓颖超、刘群先、廖似光、卢竞如、徐克立、钱瑛。妇女工作委员会积极团结和依靠妇女运动中的进步人士如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曹孟君、沈兹九等，同宋美龄建立统战关系，支持并参加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积极推动有利于抗战的许多工作。

支持和推动由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曹孟君等救国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和一些从事中上层妇女工作的秘密党员或进步骨干组织了核心妇女座谈会。座谈会经常交换意见、统一思想、协调行动、部署工作。首先在武